

專題研究

民粹主義與毛澤東： 重評毛澤東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

王振輝

摘要

以往論者在評價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時，大都強調國際因素和中國落後狀態下的民族心態使然，然而，本文以為讓毛澤東作出決策的最主要因素應是民粹主義的唯意志論和道德理想主義；本文論證，毛澤東之作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之決策便是在民粹主義思想觀照下，不僅視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為罪惡，而且想要在原本充滿平均主義的農業社會基礎上建立一個無私無我的理想社會。

關鍵字：大躍進、人民公社、民粹主義

壹、前言

目前許多中國大陸學者在論述大躍進時期的歷史，大多將毛澤東掀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歸結為國際的客觀因素在作祟¹，也有些人將它歸因於「人們對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心情」的迫切追求所形成的「民族心態」²。

本文並不否認毛澤東可能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影響以致做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¹ 李文江、曹劍、崔正華，當代春秋：共和國五十年（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頁136-140；以及陳明顯，晚年毛澤東（太原：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45；以及翁有為，「大躍進時期的『左』傾思想探析」，載河南大學學報（1996年，第36卷第1期），頁70；以及王令金，「『大躍進』之動因研究」，載棗莊師專學報（2000年，第17卷第3期），頁99；以及王軍正，「『大躍進』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探析」，載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頁70；以及John Gittings，“New Light on Mao: His View of the World”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1974. pp.750-766.以及Shujie Yao, “A Note on the Causal Factors of China’s Famine in 1959-1961,”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7, No.6, Part 1, Dec. 1999, p.1368.

² 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62。

化的決策，不過，我認為，像毛澤東在 1958 年 7 月所寫的一首〈送瘟神〉所講的：「春風楊柳千萬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³，毛澤東在其中所表述的「六億神州盡舜堯」境界，以及相信「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意志的力量，斷定人的主觀力量可以超越客觀條件的限制，這種理念或許才是促使毛澤東瘋狂躍進的最主要理由。

事實上，愈來愈多的中國大陸的研究者也都看到毛澤東「過分強調主觀能動的作用」，以致有像大躍進這樣的「主觀意志逐漸膨脹，離客觀實際愈來愈遠」的「空想」出現⁴。當然也有一些學者主張不應過分強調毛澤東個人的意志，而應該看到廣泛存在中國大陸社會各階層的烏托邦思想⁵。作者以為這兩種看法都是正確的，正是毛澤東的唯意志論與中國農民普遍的平均主義烏托邦，構成了中共建國之後試圖在農業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民粹主義衝動的思想基礎。

本文即透過毛澤東的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來檢視隱藏在毛澤東腦海深處的真正思想。

貳、大躍進：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

啟動「大躍進」的關鍵是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文中指責有一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得很慢，這些人不了解在農業合作社之後，中國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些人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⁶。毛澤東看了這篇社論之後，非常欣賞「大躍進」一詞，以為這是個非常偉大的發明，並認為發明這個詞的作者「其功不在禹下」⁷；1957 年

³ 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頁 298。

⁴ 秦興洪主編，中國的道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186；以及許全興，晚年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年），頁 134；以及翁有為，「大躍進時期的『左』傾思想探析」，頁 71；以及王玉貴、朱蓉蓉，「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與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動」，載蘇州絲綢工學院學報（1999 年，第 19 卷第 4 期），頁 17；以及郭記中，「民粹主義與人民公社化運動」，載黨史研究與教學（2000 年，第 5 期），頁 21。

⁵ 李若建，「大躍進的社會基礎」，載中山大學學報（2000 年，第 40 卷第 4 期），頁 41。

⁶ 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載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11 月 13 日。事實上，在 10 月 27 日的社論裡頭，就已首次出現『巨大的躍進』的提法，見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載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10 月 27 日。

⁷ 引自翁有為，「大躍進時期的『左』傾思想探析」，頁 70-71，翁有為評道：「顯然，躍進一詞準確、集中地表達了毛澤東推進中國發展的心態和思路，才得到他如此稱讚」。

12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的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要求「把1958年的各項計畫指標訂得盡可能先進些」⁸。

自此，從1958年1月到4月，共黨中央在杭州、南寧、北京、成都等地召開一系列發動大躍進的會議。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反反冒進」的口號⁹：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言下之意，有沒有冒進的關鍵在於思想，如果一個人思想正確、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來觀看全局，就不會去反冒進；這當然是用政治立場來判定什麼是真理、什麼是錯誤的思想，凡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就必然掌握了真理，否則就是錯誤的。就是在此一邏輯下，毛澤東才會強調：「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¹⁰。接著在1958年行舉行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確立了以追求快速發展為核心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¹¹。

由於認為思想、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所以毛澤東斷定：「只要我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稍為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¹²，「我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意指著思想靈魂的管制和宰制，以及政治意志的統一和集中，在毛澤東來說，這是經濟建設所以能夠「躍進」的前提¹³，如果這兩項上層建築的「工作」沒有做好，那麼經濟建設就跟著思想走上了「邪路」—即資本主義之路。

在毛澤東唯意志論的指導下，在中國大陸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主觀空想的旋風，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當時「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主觀空想成為黨報宣傳的真理」¹⁴，例如《人民日報》便以「十天修一座水庫」、「一天辦一個工廠」、「兩個月掃除文盲」作為經濟躍進的局面¹⁵。乃至用政治、思想的標準來檢驗一個到底是不是專家（也就是「紅與專」的問題）之類荒謬情況在全國各地普遍地展開來¹⁶。甚至還有科學家特地撰文論證「糧食畝產會有多少？」的問題，文章不但肯定已經放出來的那些「衛星」，而且還論證了土地潛能還很大，一畝可以達到四、五萬斤的

⁸ 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載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12月12日。

⁹ 翁有為，「大躍進時期的『左』傾思想探析」，頁70。

¹⁰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結論提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5。

¹¹ 翁有為，「大躍進時期的『左』傾思想探析」，頁70。

¹²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53。

¹³ 楊明偉，「『大躍進』席捲神州周恩來險些辭職」，載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頁19。

¹⁴ 翁有為，「大躍進時期的『左』傾思想探析」，頁71。

¹⁵ 社論，「領導農業大躍進的經驗」，載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9月23日。

¹⁶ 羅平漢，「『大躍進』中幾所高等院校的『拔白旗』運動」，載文史精華（2000年，第11期），頁43。

產量¹⁷。

最糟糕的是，在中共建國之後，中國大陸經過不斷地批判、鬥爭和整黨整風下，思想的全面性改造結果形成了全國意志的統一，也造成了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的情況，這就是所謂的「一言堂」¹⁸，薄一波對當時的情況有如此形象的描述：「毛主席的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麼說，大家就跟著怎麼做。這樣一些部門和省市的領導幹部頭腦就膨脹起來了，反過來又影響毛主席的思想。結果就導致了『大躍進』的發動」¹⁹。在這樣的一言堂下，中共幹部噤若寒蟬，所謂民主黨派人士當然也不再敢有所異議，「全國統一在一個思想」底下自然也造就了毛澤東推動向共產主義天堂「躍進」的最好條件。

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掛帥觀點，在大躍進的熱潮中進一步獲得人們的詮釋，當時的人們以為掌握了思想的高度、純潔性，就掌握了促進生產力躍進的鑰匙，什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之類的震天價響的口號，以及山東省范縣對共產主義新樂園的描繪都獲得毛澤東的高度讚賞²⁰。

在毛澤東的超強意志主導下，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這是一次全面發動大躍進的黨代表大會；會議中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並認為：「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口號，苦戰三年、爭取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的口號，所有這些號召，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所掌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在我國的六億多人口中有五億多農民，他們無論在革命鬥爭中和建設工作中都是一隻最偉大的力量，我國工人階級只有依靠這個偉大的同盟軍，把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充分地調動起來，才能取得勝利」²¹。

如此，工農階級靠著思想的純淨與意志的堅定，他們要同大自然展開一場生死的鬥爭了，用中國大陸學者的話來說就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下進行經濟建設²²。

¹⁷ 羅平漢，「話說一九五八年的科學『大躍進』」，載文史春秋（2001年，第1期），頁25。

¹⁸ 王令金，「『大躍進』之動因研究」，載襄莊師專學報（2000年，第17期第3期），頁99；以及王軍正，「『大躍進』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探析」，頁72；孫運莉，「『大躍進』中的群眾運動」，載龍江黨史（1998年，第4期），頁17。

¹⁹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頁652。

²⁰ 謝春濤，大躍進狂瀾（安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08。

²¹ 毛澤東，「對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22-223。

²² 吳慶生，「對一九五八年建設總路線的再認識」，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01年，第1期），頁84。

參、全民大煉鋼運動

大躍進最著名的運動大概就是全民大煉鋼。我們就以全民大煉鋼為例，來看看工農階級的生產是如何「躍進」的。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據中共學者云，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發動、領導大躍進運動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它全面制定了「大躍進」運動的各項主要計畫，把共產黨的「左」傾錯誤誤指導思想發展到登峰造極²³。

北戴河會議首先就認定，在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突破農業技術的常規之後，1958年出現了農業生產飛躍發展的情形，農產品產量有了數倍、數十倍的增長；會議估計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基本解決，並要求今後各級政府的工作重心應該由農業轉移到工業上去²⁴。而工業建設中鋼鐵的產能是一項重要的指標，而且是擠身先進國家的唯一指標，於是「以鋼為綱」變成工業生產的唯一方針。北戴河會議並且具體地提出鋼的產量，會議認為：「根據當前全國人民對於鋼鐵的巨大需要和對於鋼鐵生產的巨大努力，根據鋼鐵冶煉設備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產的情況，鋼鐵生產的飛躍發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²⁵，會議決定把原先1958年鋼鐵產量的指標六二〇萬噸提高為一〇七〇萬噸（也就是增加一倍）²⁶，會議更決定1959年的鋼鐵產量為二七〇〇萬噸，爭取三〇〇〇萬噸²⁷。

問題在於，北戴河會議為1958年所制定的一〇七〇萬噸鋼產量的指標，當時已是九月，1958年全年時間已過了三分之二，而鋼產量指標只完成四〇〇多萬噸的情況下，要在三、四個月之內完成六七〇萬噸的任務，勢必導致一個情況：不顧其它經濟建設、全力保鋼的全民大煉鋼運動，而這一大煉鋼運動也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²⁸。

按中共學者的說法，北戴河會議提出鋼鐵產量要在1958年內翻一番，在當時條

²³ 同註20，頁73。

²⁴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載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9月1日。

²⁵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

²⁶ 1958年原計畫為六二〇萬噸，到了成都會議第二本帳規定為七一〇萬噸，五月底政治局擴大會議又提高到八〇〇—八五〇萬噸，至6月19日，毛澤東在聽取幹部匯報時，才把它提高為一一〇〇萬噸的。見丁守和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太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634。

²⁷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

²⁸ 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頁77；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Chap.10.

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何是不可能的呢？這是因為：首先在時間上是不可能的，1958年1至8月每月的產量為五六·二五萬噸，而要在剩下來的四個月內生產六二〇萬噸，平均每月產量要達一五五萬噸，也就是每月產能要提高257%，這實在是是不可能的任務；其次，鋼鐵生產本身的各個生產環節的生產能力嚴重不足，從採礦、煉鐵、煉鋼、軋鋼等方面都存在極為嚴重的技術與產能的問題；再次，在煉鋼所需的煤炭、電力和交通運輸各個方面的配合能力與調度的困難，也都難以確保鋼鐵翻一番的達成²⁹。

但是為了達成毛澤東以鋼為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各級中共黨委第一書記親自掛帥，實行「大兵團作戰」，發展群眾運動，各行各業都把支援和保證大煉鋼列為首要任務，據估計，當時全國參加大煉鋼鐵運動的勞動人口高達九千萬人，全國新建上百萬座煉鋼土爐，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展開人類歷史規模最為龐大的土法、群眾運動方式的全民大煉鋼³⁰。

然而，全民大煉鋼卻是對中國經濟造成災難性的後果³¹，其中最主要的是，削弱了農業、擠掉輕工業，使各部門經濟發展的比例嚴重失衡，重工業的產值占總體經濟產值的比例由1957年的25.5%上升到1958年的35.2%，而由於勞動人口抽調去支援大煉鋼，使得農業生產力急速衰退³²；其次是基礎建設規模盲目且急遽地膨脹，造成國家財政的極大負擔和困難，更形成積累與消費比例的失調現象；再次，人民生活開始出現困難，如前所述，1958年糧食生產比增加2.5%，而人口則大幅度的增產，再加上大煉鋼運動人民勞動力日夜拼戰，糧食消耗量奇大，人民公社大辦食堂亦造成嚴重的浪費現象，結果到了1959年春天，一些地方出現糧食短缺的現象，人民開始逃荒，這個問題隨著大躍進的發展更形嚴重。

上述概括性的描述可能還不足以看出大躍進對中國大陸所造成的災難之巨大，我們以四川省安縣的情況為例來說明其具體的為害。

安縣原本是一個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質肥沃，物產十分豐富的縣分，在1957年時，全縣有耕地六六·八七萬畝，全縣人口是三〇·四萬人，人平均有田二·一九畝；但在大躍進的全民大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中，在高指標、瞎指揮和「共

²⁹ 趙德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安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84。

³⁰ 孫運莉，「『大躍進』中的群眾運動」，載龍江黨史（1998年，第4期），頁17。

³¹ Patricia Powell and Joseph Wang, "Propaganda Posters from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Historian*, Vol.59, No. 4, Summer 1997, p.778.

³² 據統計，1958年農業生產方面，糧食增長2.5%，棉花增長20%，可是豬產量卻減少了5.2%，大型牲畜產量也下降到1952年的水準，農業總產值在經濟總產值也從1957年的43.3%下降為34.3%。以上數據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頁23、27、109。

產風」的指導思想下，1958年糧食實際產量為一三六一二萬公斤，比1957年減少了二四九萬公斤，1959年則為一一六二八·八萬公斤，又比1958年少了一九八三·二萬公斤；1960年實際糧食產量為八七二〇萬公斤，比1959年又少了二九〇八·八萬公斤；糧食的減產當然帶動了市場商品價值的上漲，尤其是農副產品價格的飛漲，在1959年11月之後，就造成嚴重的缺糧，餓死的人開始大批大批地出現，從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縣有19.9%的人沒有糧食吃，主要有馬苕和野菜充飢，還有去挖白泥巴吃的，甚至有人餓得受不了最後去吃死人肉的情況；由於缺糧和生活極度的困苦，各種疾病大規模地傳染開來，死人四處可見，從1959年到1960年一年多的時間裡，全縣死亡人數高達二九八七七人，占總人口的10.4%。

不僅安縣的情況如此，全國各地的問題更是惡化，各地死亡人數隨著大躍進的推進愈發嚴重³³，糧食的短缺、加上氣候的乾旱、政府處理的不當，再加上連年的政治運動，更讓原本的問題雪上加霜；據估計，從1959年到1961年不到三年間，中國大陸各地到處發生吃人的現象，而且全國死亡人數高達三千多萬人³⁴。

事實上，在1959年之後，特別是在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向共產黨猖狂地進攻，為了把這種「歪風」打下去³⁵，於是他發起更大規模的躍進，大躍進愈演愈烈，到了1960年全國的形勢已經完全失控了。針對這一系列的發展，中共學者深切地反省說：

八大二次會議發展了自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政治、經濟和思想理論上的一系列「左」傾錯誤，從而否定了八大的正確路線，正式形成了「左」的指導思想。…從社會根源看，中國社會的小生產基礎廣闊，傳統深厚。小生產者缺乏科學知識，更缺乏科學精神，始而急於求成，終於陷入了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³⁶。

³³ 陳興榮，「對『大躍進』期間『安縣落後』的歷史思考」，載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頁137-138。

³⁴ 關於大躍進期間死亡人數各家說法不一，有說三千到六千萬人之多如 Arthur Waldron, “‘Eat People’—A Chinese Reckoning,” *Commentary*, Vol.104, July 1997, p.29; and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aseil Ashton et al., “Famines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Devel. Rev.*, Vol.10, No.4, Dec, 1984. 但也有學者以為實際死亡人數是三千零七十九萬人，如 Shujie Yao, op.cit., p.1366. 更有相信中共官方所公布的較低死亡人數只有一千五百萬左右的學者，如 Carl Riskin, “Feeding China: the Experience since 1949,” 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Vol.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³⁵ 文聿，中國『左』禍（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頁352-353；任全才，「1959年廬山會議是糾『左』嗎？」，載天府新論（1994年，第5期），頁33；劉濟生、宋歌，「廬山會議破壞黨內民主的幾個特點」，載哈爾濱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頁70；曹順霞，「試析廬山會議糾『左』中斷的原因」，載江西大學學報（2000年，第21卷第3期）；李華，「廬山會議糾『左』變成反右解讀」，載新餘高專學報（2002年，第1期）。

³⁶ 劉吉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570。

肆、早產的人民公社新社會³⁷

在 1958 年掀起的生產大躍進浪潮和毛澤東激進思想指導底下，中國大陸普遍興起人民公社化運動，作為邁向理想共產主義的「橋樑」³⁸。

中共學者許全興在檢討大躍進時講到：「犯大躍進冒險錯誤的重要哲學根源之一是誇大了精神的作用，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³⁹。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對毛澤東思想來說，確是一針見血。完全強調主體能動性而不顧客觀的限制，「彷彿牙一咬，就可以讓飛機上天，氣上鼓，就可以讓河水倒流」，這就是學者所說的「唯意志論」⁴⁰。

事實上，單憑社會主義經濟生產的大躍進並不能保證中國大陸建立理想天堂，它必須透過人民公社化運動來加以確證，人民公社化運動事實上就是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邏輯結果，它的實質就是改變整體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換言之，大躍進不只是在經濟建設方面不斷地躍進，在改造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上，全國上下盲目地追求愈大愈公，所謂「愈大愈公」就是認為幾個小社合併成為大社⁴¹，集合集體的力量，它的生產力將遠超過私有制的生產，在這種推論底下也就產生了「越共越好」的認知了⁴²。

依此他們認定，公社組織規模愈大就愈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一步；在此認知底下，1958 年中國大陸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烏托邦建設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⁴³。

依照中國大陸學者指出，事實上，毛澤東要搞人民公社的構想是早在 1955 年的，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做的〈大社的優越性〉一文的按語中，就已顯出端倪了⁴⁴。據胡喬木的回憶，1958 年 2 月至 3 月間，毛澤東與人談

³⁷ 劉少奇，「關於國內形勢與三面紅旗問題」（1962 年），載黨的文獻（1995 年，第 1 期），頁 19。

³⁸ 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460；以及馬洪等主編，當代中國經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99；以及楊洪濤，「天堂實驗紀事——回眸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建立」，載中州統戰（1998 年，第 5 期），頁 28。

³⁹ 許全興，晚年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頁 134。

⁴⁰ 張艷國、張德鵬，「論『大躍進』時期毛澤東發展生產力的思路與方法」，載經濟評論（2002 年，第 2 期），頁 13。

⁴¹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頁 354。

⁴² 趙雲山等，「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載黨史通訊（1987 年，第 6 期）。

⁴³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編寫，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頁 117。

⁴⁴ 劉明華，「大同思想對毛澤東政治理想的影響——兼論『人民公社』的悲劇性實踐」，載新東方（1996 年，第 5 期），頁 33。

起社會主義的建設問題時，談到鄉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什麼都學，將來就是共產主義雛形⁴⁵。後來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轉達毛澤東意思的發言透露出毛澤東心目中的理想構想及其思想淵源，他說：

毛主席和劉少奇談到幾十年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的民警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⁴⁶。

1958年7月，毛澤東的理論智囊陳伯達寫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發表在《紅旗》上，陳在文中讚揚湖北省鄂城縣旭光農業社「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⁴⁷，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人民公社」這個概念，也透露出毛澤東的思維方向。

1958年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時談到：「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⁴⁸。毛澤東這番話經於《人民日報》在8月13日的公開發表，各地幹部聞風而動，不等共黨中央及中央政府文件下達就競相建立公社。8月29日，中共中央召開北戴河會議，在會議上毛澤東談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有過二十二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不發薪水，搞供給制，結果是軍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進城以後，熬了幾年，搞了薪金制，軍銜制，其實是把供給制變成資產階級法權，發展了資本主義思想⁴⁹。

毛澤東的意思相當清楚地表達了緬懷過往戰爭時期實施軍事共產主義的偉大成就和理想生活，並且表達了對建國以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不滿。也就是說，毛澤東以為一旦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這種「上層建築」，便可迅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⁵⁰。

⁴⁵ 引自甘毛文，「略談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及其思考」，載廣西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6卷第2期），頁95。

⁴⁶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32；這個發言也見劉吉主編，中國共產主義七十年，頁577。

⁴⁷ 陳伯達，「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載紅旗（1958年7月1日，第3期）。

⁴⁸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頁60；以及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40。

⁴⁹ 引自張桂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社會主義思潮問題」，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7卷第3期），頁47。

⁵⁰ 金春明、陳登才主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頁689。

於是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北戴河會議通過經由毛澤東修改定編〈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和〈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的指示〉，其中〈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⁵¹。

決議與指示同時下達，中央並明令用大辯論和放手發動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推動⁵²，於是全國各地普遍掀起大規模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到了1958年9月底，全國原本七十四萬多的農業合作社，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合併改組成二萬三千二百八十四個人民公社，即平均以二八·五個高級社合併成一個人民公社⁵³，每個公社平均有四千七百六十七戶，入社的農戶占全國總數的九九%以上⁵⁴。可以說，在毛澤東鼓動的狂潮底下，中國大陸在短短幾個月之內就完成了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依中共當時形象的說法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⁵⁵。

中國人民公社的本質是一種農業集體化，這是企圖透過集體的力量來改造人性的一種方式，此種集體主義者深信，集體的生產力不只高於個別的私有制，而且愈大團體的協作，生產力就愈高⁵⁶，抑且透過集體所有制，使人們在道德上去私從公，這是因為毛澤東向來認為，只有貧窮到一無所有的「貧農」才可能有完全的共產主義道德與意志⁵⁷，所以只有到了全民所有制的時候，也就是每個人都沒有了私有財產的負荷時，才能進入理想的社會；按著毛澤東的話來說是：屆時「全體人民的共產

⁵¹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編寫，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頁117。

⁵² 張壽春，「人民公社化運動及人民公社問題研究綜述」，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84。

⁵³ 劉洪英，「人民公社的興亡和歷史的反思」，載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41。

⁵⁴ 張桂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社會主義思潮問題」，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7卷第3期），頁46；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頁108。

⁵⁵ 劉明華，「大同思想對毛澤東政治理想的影響——兼論『人民公社』的悲劇性實踐」，頁34；其中河南省的人民公社化的速度更是驚人，毛澤東在八月六日視察河南省農業生產和集體化時高度讚揚集體化的成就，特別是參觀了七里營的人民公社之後，說了「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結果，河南全省受到了鼓舞，在短短不到半個月內，全省幾乎完全人民公社化，參加公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99.996%，見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9月2日，以及袁德，「對河南省首先實現人民公社化的歷史考察」，載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4卷第6期），頁56-57。

⁵⁶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頁515；以及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504；以及陳立旭，「五〇年代後期毛澤東由人民公社構想社會主義模式的思想」，載長沙電力學院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2期），頁8-9；以及辛逸，「人民公社的歷史地位」，載石油政工研究（2002年，第1期），頁60；Chu-yuan Cheng,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Rural Communes in Communist China," *Asian Survey*, Vol. 1, No. 9, Nov. 1961, p.9.

⁵⁷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頁520。

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⁵⁸。不過，正如學者所云，中國農業集體化並不像是蘇聯的集體農場那樣自然演化而來，而是站在土地改革將農民組織起來的社會基礎上，之後再透過計畫經濟強迫結合而產生的⁵⁹。

這個被劉少奇稱為辦得太早的人民公社有著以下的特徵是：

首先，人民公社是一種單一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它所講求的便是「公平」；因為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公社後，根據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應該將一切財產交給公社，如此，將幾十個貧富不一，條件各異的農業社合併為一，由公社來統一核算，統一分配，中共把這種作法名為「提高公有化」程度，實則用集體力量強迫地拉平了貧富差距的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的烏托邦⁶⁰。

其次，人民公社是一種大而全的基層社會組織；人民公社所追求的是一個沒有社會分工，沒有商品交換，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理想社會，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一大二公」，大，就是指規模大，一鄉一社，人民公社是政治組織，也履行經濟職能，它更是一種軍事組織，中共希望人民公社達到政社合一，一個生老病死、食衣住行、教育文化都由公社成員自行解決的組織，藉以達到「公」的境界，即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⁶¹、不分你我、沒有私有制、沒有商品交換的完美社會形態⁶²。

第三，人民公社推行供給制的分配制度；在推行人民公社期間，中國農村不少公社對伙食、穿著、住房、生育、就學、治療和婚喪等基本生活需求實行所謂的「七包」，有些地方還擴大包的範圍，實行「十包」、「十五包」，包的範圍愈來愈廣，也愈來愈荒唐⁶³。從 1958 年秋天開辦人民公社開始，當時正值秋收季節，公社手中有糧食，於是就響應「吃飯不要錢」的號召⁶⁴，實行「敞開肚皮吃飯，過共產主義生活」。

⁵⁸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 360。

⁵⁹ Michael S. Kochin, "De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Planned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3, August 1996, pp.719-720. 不過，Michael S. Kochin 也注意到了雖然是在計畫經濟的驅迫下結社，中國的集體農場卻有其內在控制（internal control）機制，而不是透過黨組織來控制的；以及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頁 756-766；以及孫保定，「『大躍進』期間的河南農村人民公社」，載黨的文獻（1995 年，第 4 期），頁 46。

⁶⁰ 張壽春，「人民公社化運動及人民公社問題研究綜述」，頁 84；李若建，「大躍進的社會基礎」，頁 42。英文的 egalitarianism 或 equalitarianism 也有譯成「平等主義」者，其意義便是要求每個人都平等，並且運用他們的責任平等地互相對待，見 Kasper Lippert-Rasmussen, "Egalitarianism, Option Luck, and Responsibility," *Ethics*, Vol.111, No.3. Apr., 2001, p.549;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 2000, pp.65-119.

⁶¹ 此為毛澤東的用語與構想，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 740。

⁶² 馮有林等，「湖北當陽跑馬公社的『共產主義』考」，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⁶³ 徐水縣的十五包，甚至連洗澡費、理髮和看電影的費用都給包了進去，見趙雲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始末」。

⁶⁴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58。

第四，人民公社除「一大二公」之外，最大的特徵便是「三化」，也就是勞動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在當時中國大陸物質生活極端匱乏的條件下，「三化」即是實現類似戰爭時期的軍事共產主義，在統一意志底下集體勞作、集體行動和集體生活⁶⁵，有些地方甚至還強迫夫妻分居，一律到男女宿舍去居住⁶⁶，重現清末太平天國的烏托邦構想⁶⁷。

到了1960年上半年，在農村人民公社化之後，又大辦城市人民公社；1960年3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化的批示〉，要求各地採取積極態度，放手發動群眾，試驗組織以國營廠礦為中心，以機關學校為中心，以街道居民或者城市郊區再加上一部分農村為主體等各種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普遍試點，下半年普遍推廣⁶⁸；於是全國各大城市開始大辦公共食堂，大辦城市街道工業，當時商業、手工業、服務業升級的升級，合併的合併，轉業的轉業，所有的商業基本上完全公有化、單一化。結果全國上下只剩下國營商業，沒有供銷社，沒有個體戶，也沒有服務業了，商品經濟完全消失殆盡，經濟發展如一潭死水般完全停滯了⁶⁹。

人民公社化運動在本質上可以說是，要在極短的時間內透過政治運動的方式強迫人民放棄私有財產、過集體生活的「共產風」⁷⁰，正如學者所說的，由於在主觀上急於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和社會差別，實現平等的社會理想，因此，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上陷入了超越階段與現實的空想烏托邦之中⁷¹。

其實將人民公社這個毛澤東的「烏托邦的夢想」與毛澤東在青年時期的「新村」相互比較一番，我認為，其思想脈絡是清晰可見的⁷²；然而，毛澤東這一理想社會的夢想並不是在大躍進失敗就頓然清醒了，就如同學者所云，到了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依然「決定以他的意志，去對抗一些他無法接受的事實」⁷³，例如1960年6月

⁶⁵ 康瓊，「人民公社興起的歷史反思」，載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30卷第3期），頁62。

⁶⁶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鄉村建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91。

⁶⁷ 李若建，「大躍進的社會基礎」，載中山大學學報（2000年，第40卷第4期），頁42。

⁶⁸ 李端祥，「城市人民公社化運動初探」，載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20卷第2期），頁26-27。

⁶⁹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輯，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60、61。

⁷⁰ 馬洪等主編，當代中國經濟，頁340。

⁷¹ 甘毛文，「略談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及其思考」，載廣西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6卷第2期），頁96；以及王秋成，「關於『人民公社』的歷史反思」，載理論學刊（2000年，第1期），頁102-103。

⁷² 謝春濤也有相同的看法，見謝春濤，大躍進狂瀾（滎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12-113。持相同看法的學者還有，劉明華，「大同思想對毛澤東政治理想的影響—兼論『人民公社』的悲劇性實踐」，頁35；當然，我也承認，毛澤東人民公社還受到其它思想的影響，例如像巴黎公社，見林英海主編，毛澤東在河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98。

⁷³ Ross Terrill, *China in Our Time: the epic sag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om the Communist victory to Tiananmen Square and beyond*,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2, p.70.

18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了一篇名為〈十年總結〉的文章，雖然是間接承認他在大躍進時期所犯的錯誤：「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但是他是強調：「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且看看他所持的理由是：「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⁷⁴。

從毛澤東的語氣可以判斷出，他似乎非完成這個真理不可了，而歷史也證明其意志是相當堅決的。

伍、結 論

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表徵了毛澤東以其道德理想主義來建構一座通往共產主義社會的「金橋」之實踐，據學者所云，這個思想乃源自毛澤東青年時期「新村」實踐的那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王國」，在1958年時，毛澤東只不過運用他掌握的國家機器來實現他青年時期的宏願——在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同實踐」——罷了⁷⁵。

不過，有學者卻將毛澤東所要建構理想社會形容成一種病態的烏托邦，他是這麼說的：

「泡沫經濟」終究還有一種泡沫般的經濟繁生的表象，而「大躍進」時代的經濟行為實際是一次社火般的激情遊戲。更深刻地看，這場看似熱鬧的激情遊戲，實則更像是一種社會政治的化妝舞會，其背後湧動的是某種看似洶湧而實則虛幻的「泡沫道德」(Bubbly morality)，或者叫做惡性理想主義的道德烏托邦⁷⁶。

事實上，就毛澤東而言，從建國以後的土改到大躍進，甚至到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些運動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從精神到制度的全方位革命⁷⁷。此種全方位革命背後所潛藏的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首先，它相信中國社會的問題在於思想觀念，因為思想與道德乃是一體兩面的，思想不潔，道德亦污，如此自私

⁷⁴ 毛澤東，「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97-198。

⁷⁵ 張桂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社會主義思潮問題」，頁46；以及劉明華，「大同思想對毛澤東政治理想的影響——兼論『人民公社』的悲劇性實踐」，頁35-36、37；以及王玉貴、朱蓉蓉，「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與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動」，頁17。

⁷⁶ 萬俊人，「『泡沫道德』與『大躍進』」，載社會科學論壇（2000年，第2期），頁47。

⁷⁷ Philip C. C. Huang,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106-107.

與腐化的國民性，是不可能健全理想的社會的；其次，它迷信意志的力量，認為人的主體能動性是建構理想社會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毛澤東一再強調和珍視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認為有了這樣的積極性，再困難的客觀條件都是可以克服的，就像毛澤東自己在 1959 年對幹部所說的：「一有意志，萬事皆成」、「我們戰勝地球，建立強國，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⁷⁸；再次，道德理想主義者主張「去私從公」，特別是毛澤東更是迷信集體的力量，毛澤東相信透過集體所有制可以消滅人的私欲，造就他所謂共產主義新道德，以期建立「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聖賢社會。

而事實上，毛澤東的這些構想並不完全像論者所說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誤解⁷⁹，我認為，有相當的程度乃是來自其師楊昌濟理學思想對他的影響。理學家一生追逐道德理想主義的平等、自由烏托邦，究其實，這樣的烏托邦就是農民大眾的夢想在知識分子思想上的反應；自此而論，實際上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只不過是中國數千年來無數農民起義中的一場，而農民起義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根據農民的期望與價值所制訂出來的平均主義（*equalitarianism*）理想社會⁸⁰，只是在近代，人們把這種平均主義理想社會稱為農民的民粹主義反應（*populist reaction*），這種民粹主義反應即使在鄧小平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之後，仍普遍存在於中國人民心靈之中⁸¹，可見其觀念之根深蒂固；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本質上就是傳統中國式的民粹主義的革命，只不過它是知識分子和農民兩個領域的人互為影響的革命⁸²。

這就如毛澤東在 1958 年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印發《張魯傳》時所寫的批語：「現

⁷⁸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523、524。

⁷⁹ 方敏，「重新認識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與列寧過渡時期學說的關係」，載《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4期），頁57；王德中，「列寧過渡時期理論與中國共產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理論依據的再認識」，載《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學報》（2000年，第16卷第4期），頁98。

⁸⁰ 王振輝，「論當代學者對晚年毛澤東烏托邦思想根源之詮釋」，載《共黨問題研究》（2001年，第27卷第8期），頁20；Daniel Kelliher,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Peasantry," *Modern China*, Vol.20, No.4, Oct. 1994, p.391; John P. Burns, "Local Cadre Accommodation to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Rural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58, No.4, Winter, 1985-1986, p.624. 根據傅允生所講，中國傳統的農民革命深受道家平均主義思想的影響，見傅允生，「平均主義的思想淵源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以及李若建，「大躍進的社會基礎」，載《中山大學學報》（2000年，第40卷第4期），頁42。

⁸¹ Linda Hershkovitz, "The Fruits of Ambivalence: China's Urban Individual Economy," *Pacific Affairs*, Vol.58, No.3, Autumn 1985, p.447; Jan S. Prybyla, "The Chinese Economy: Adjustment of the System or Systemic Reform?" *Asian Survey*, Vol.25, No.5, May 1985, p.584; Liu Alan P. L., "Problems in Communication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Asian Survey*, Vol.22, No.5, May 1985, p.482; Jan S. Prybyla, "Key Issu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sian Survey*, Vol.21, No.9, Sep. 1981, pp.935-936.

⁸² David Ownby, "Chinese Millenarian Traditions: The Formative Ag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4, No.5, Dec. 1999, pp.1515-1529.

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毛澤東說，它就是繼承了從張角、張魯、黃巢、方臘、劉福透、韓林兒、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人以來的農民革命，他們都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的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⁸³，所以毛澤東稱讚張魯「道路上飯舖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⁸⁴。

由此可見，學者所稱近百年來重視農民群眾的民粹主義思想登上中國舞臺⁸⁵，其實淵源深厚。

⁸³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 628。

⁸⁴ 同前註，627。

⁸⁵ James R. Townsend, "Chinese Populism and the Legacy of Mao Tse-tung," *Asian Survey*, Vol.17, No.11, Nov. 1977, p.1003.